

唐赋研究三十年述评 (1978 ~ 2008)

刘伟生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近 30 年来,唐赋研究不仅在观念上得到了重视,在实践上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更为可喜的是,在赋学会议与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中,唐以后的赋尤其唐赋所占份量日益增多,这无疑标示着唐赋研究良好的势头。汉赋与唐诗研究的某些视角与手法可以成为唐赋研究的重要借鉴。

关键词:赋;唐赋;赋史;赋论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 - 117X(2010)01 - 0139 - 06

Review of Tang Fu Research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1978 - 2008)

LU Weishe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In the recent three decades, we have not only laid great importance on the research of Tang Fu ideologically, but in practice, grea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gained. It is enjoyable that the number of research on Fu after Tang Dynasty and especially during Tang Dynasty chosen by Fu research societies and by master and doctorate students is increasing, indicating undoubtedly a good tendency in the study of Tang Fu. Some perspectives and study methods used in the studies of Han Fu and Tang poetry may serve as important references for the study of Tang Fu.

Key words: Fu; Tang Fu; Fu history; Fu theory

赋是中国所独有的古典而雕琢的文学体式,近代以来,随着文学革命的兴起,赋体文学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对赋体的关注也一直处于文学研究的边缘地带,20世纪前 80 年有关赋体文学研究的专文与专著乃至文学通史中的专章都极为有限,而且这些有限的研究大都因袭前人观点,重汉赋而轻唐宋以后的赋。1978 年开始,学界在反思过去的同时,不断地更新文学批评的观念,开拓文学研究的视野,赋体文学的研究也因此得以发展与繁荣。自 2000 年以来,对唐及以后赋的关注开始成为赋体研究的学术增长点,我们可以从文献整理与普及、断代与分体研究、作家作品研究、赋学赋论研究、学术交流与

学位论文选题等方面,更清楚地了解近 30 年来唐赋研究的具体状况。

一、文献整理与普及

文献整理与普及是文学研究中的基础性工作。马积高先生在撰写《赋史》之后,即着手主持编纂大型赋体文学总集《历代辞赋总汇》,并出版关于赋体文学研究文献的综合性著作《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对唐赋史料作了全面系统的评述。程章灿先生的《赋学文献综论》从别集、诗文话、赋话、史传、书目、诸子、笔记、类书和出土文献等十个方面,论述各种形态的赋学文献及其赋史意义,刊于凤凰出版

收稿日期:2009 - 11 - 01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辞赋通史”(08AZW001);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立项课题“《历代赋汇》赋序研究”(0806016A)

作者简介:刘伟生(1970 -),男,湖南涟源人,湖南工业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教学。

社2004年新出《历代赋汇》卷首,后收入中华书局2005年出版的《赋学论丛》(程章灿著)。该书还辑有《唐宋元石刻中的赋》、《太平广记中之唐赋佚文及存目》、《唐代试赋命题》、《赋珍考论》、《闽南唐赋考评》等文章。

20世纪关于唐赋最重要的文献工作是敦煌赋的发现与整理,尤其是近30年来,敦煌遗书所存唐人赋作得以全面系统地整理与研究。其中翘楚,当数潘重规、张锡厚、伏俊琰诸位先生。潘重规《敦煌赋校录》(《华冈文科月报》1978年第11期)与张锡厚《敦煌赋集校理》(《文学遗产增刊》1989年第18辑)分别校理了11篇与13篇赋作。1994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伏俊连《敦煌赋校注》,收录赋作25篇,是对现存敦煌遗书中赋作的第一次全面整理。1996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张锡厚《敦煌赋汇》,校理出敦煌赋作27篇,比其他研究者又有超出。关于敦煌赋研究的其它情况还可参考伏俊连《敦煌赋研究八十年》(《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值得一提的是台湾逢甲大学的简宗梧先生率领同仁从2004年开始编辑《全唐赋》,2007年又在此基础上编辑《全唐赋选注》,这于唐赋的整理与普及无疑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近30年来,各种赋体文学选本的涌现,促进了赋体文学的普及。这些选本或以时分,或以类别。时分的以汉魏六朝及通史性质的居多,类别的以抒情小赋居多,也有咏物赋选。这些选本中收录唐赋较多的有毕万忱、何沛雄、罗忼烈等选注的《中国历代赋选》,曲德来、迟文浚、冷卫国主编的《历代赋广选、新注、集评》。前者共4卷,收录了先秦至近代赋家126人,赋作197篇,在选文上,该书改变了以往所选篇目在时代上前重后轻的局面,选录了先秦至六朝赋家48人,赋作95篇,唐宋至近代赋家78人,赋作102篇。后者共6卷,300余万字,收赋甚广,从先秦荀子的《赋篇》开始直到清代,共计209位作家、366篇作品,其中唐代赋家32位。

二、断代与分体研究

20世纪尚未出现关于唐赋研究的专门著作,对唐赋发展较系统、全面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一些赋学通史、通论的著作中。20世纪赋学研究的第一部专著是陈去病的《辞赋学纲要》,该书对赋史的论述,起于荀卿赋,迄于唐宋赋。日本人铃木虎雄的《赋史大要》是20世纪中国学者见到的第一部完整的

通史,该书采用分段与分体结合的方式,以6种体式将赋史分成6个时期:骚赋时期(自屈宋前后至汉文帝、景帝时期),辞赋(古赋)时期(自汉武帝至魏晋之交),俳赋或骈赋时期(自曹植始,下及先唐),律赋时期(以唐代为主,及于宋初,并附带论及金元明之试赋),文赋时期(以宋代属之,兼及元明时代),八股文赋时期(以清代属之)。这种写法切合赋体文学的特质,能使读者更清楚地了解赋体形式的流变历程。20世纪80年代后对赋学的研究渐次增多,1982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了张正体、张婷婷父女合著的《赋学》一书。

对唐赋研究的重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马积高先生的《赋史》。《赋史》打破前人“唐无赋”说的成见,着眼于赋体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发展,提出唐代为辞赋发展的高峰,并对唐及唐以后赋体文学的发展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赋史研究中“以汉赋为中心”的观念,主要是受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法的影响,而在马先生看来:“有时体现于某一时代文学特点中的东西,并不一定就是好东西,而在当时不占主导地位的东西,倒很可能是那个时期的精华”。^{[1][57]}所以他提醒人们勿以大赋等同于汉赋,勿以偏概全。所以他认为“赋是盛于汉,但汉赋不是赋作成就的最高峰”,而“唐赋是赋的发展高峰”。^{[1][10-11]}在此前的《论唐赋的新发展》(《湖南师大学报》1986年第1期)一文与此后的《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一书中,马先生也都从赋体文学的因革着眼,论证了唐赋的历史地位。

马先生对唐赋的重视无疑影响着后来的研究者。张啸虎的《唐赋略论》(《贵州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认为唐赋对汉赋“劝百讽一”的通病有所克服,而且更突出了讽谏的内容;唐赋题材广泛,作者众多,一些赋作能做到诗、文、赋三者结合,显示出唐赋的独特风格。余重的《关于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也认为赋史研究应该注重唐宋元明清的赋,唐赋“在思想高度和艺术境界上都超过了汉魏六朝赋的水平”。^[2]霍松林先生的《论唐人小赋》(《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认为,真正能体现唐赋特色的是各种各样的小赋,文章从赋的诗化、主体意识的高扬、体裁的多样与创新三个方面论述了唐代小赋的成就。

叶幼明的《辞赋通论》在第三章“辞赋发展概述”中,把辞赋发展分成五期:先秦是辞赋的发轫期,汉代是辞赋的发展期,魏晋南北朝是辞赋的转变

期,唐宋是辞赋的高峰期,元明清是辞赋的衰落期。这是对马先生唐赋高峰说的直接继承。郭维森、许结的《中国辞赋发展史》一书,也把唐赋分成初、盛、中、晚四个阶段来论述,并有专节论述律赋与俗赋,在篇章结构上与马先生《赋史》不无相似之处。俞纪东《汉唐赋浅说》一书,也认为赋兴于汉,盛于唐,是“古代尤其汉唐间备受重视的一种文体”(前言),因此以汉、魏晋南北朝、唐赋作为该书的研究对象。

但沿袭传统观念或者提出另见与异议的也不乏其人。万光治的《唐宋赋地位论略》(《文史哲》1990年第5期)认为,魏晋是赋体文学发展史上境况最好的时期,唐宋以来赋体中衰、中兴,从此走向没落。许结的《赋史 异议》认为“唐赋高峰”论难以确立。依据是《赋史》陈述的关于唐赋高峰说的理由“仍属‘审体’范畴,对‘赋艺’本身如何发展到唐代而臻极致并无明确显示。”^[61]事实上,中国辞赋的发展有着承继嬗变的全过程,如由楚骚而大赋再到魏晋六朝骈赋、以及唐宋文赋等,很难说谁是“高峰”。如果从“审体”角度考虑,唐赋兼备多体,或可谓“高峰”;如果从赋艺“体国经野、义尚光大”,“宏衍博丽、敷典离文”的特征考虑,汉赋又极一时之盛,或可谓“高峰”;如果从用词精美,造语华丽方面考虑,六朝骈赋又可谓“高峰”。假如仅从作品的内容考察,我觉得也是代有平泛之作,代有刻挚之篇,“高峰”论难以确立。^[43]

赋学研究实际上仍有不少以唐前的赋为主要探讨对象,比如高光复的《赋史述略》、朱碧莲的《中国辞赋史话》;仍有认为唐赋是赋的中衰时期的,比如袁济喜的《赋》,这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不过,更值得我们欣慰的是,21世纪迎来了唐赋研究的高潮,不光发表了大量关于唐赋的论文,还出版了关于唐赋的专著以及不少以唐赋为题的学位论文。

韩晖的《隋及初盛唐赋风研究》一书是较早分段研究唐代赋学的,“作者第一次从宏观角度,从赋体文学创作实践和赋学批评两方面,结合时代、社会、文化、心理诸因素对这一时期赋风的演变及其面貌进行了具体描述,探寻了辞赋盛唐气象形成的过程。”(费振刚)^[41]^[291]“可以说是一部断代的、富有特色的兼具赋史与赋学批评史功能的赋学论著。”(龚克昌)^[41]^[290]赵俊波的《中晚唐赋分体研究》从时间上看,正好与韩著对接。从体例看,作为断代的研究,作者选择以分体为主,兼及历时性研究的方法,“以便能更集中地对某一种体式的发展进行审视。”^[517]

说到分体的研究,唐赋最受人关注的当然还是律赋。如前所述,大多数赋史研究中都论及律赋,此外曹明纲的《赋学概论》、邝健行的《科举考试文体论稿:律赋与八股文》、王兆鹏的《唐代科举考试诗赋用韵研究》等著作中,对律赋的文体特征及其发展演变等有系统、深入的论述。研究律赋的专门著作则有尹占华的《律赋论稿》,书分上下两编,上编考察律赋与科举的关系,下编为律赋发展史。

由于赋体体式具有非诗非文、亦诗亦文的兼综特征,赋与他种文体的关系错综复杂,而这也成为赋体研究的重要对象。唐赋因为众体兼备,自然也成为重中之重。最引人注目的是诗的赋化与赋的诗化问题。赋一方面被认为是古诗之流,并在其发展历程中不断受到诗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反过来影响着诗的发展。朱光潜先生的《诗论》说,“中国诗走上‘律’的路,最大的影响是‘赋’。”^[61]^[197]律诗形成过程中,句子的对仗是一个重要因素。对于律诗和赋来说,意义的排偶,先于声音的对仗,而“意义的排偶,赋先于诗”,^[61]^[204]“声音的对仗,赋也先于诗。”^[61]^[206]朱先生这一论断对理解六朝至唐代诗赋关系的演变不无指导作用。商伟的《论初唐诗歌的赋化》一文提出,“由六朝至初唐,辞赋诗化的过程始终支配着诗歌赋化的过程,并最终汇入诗歌发展总的时代潮流中去了。”^[71]在赋的去路问题上,商文侧重的是诗化。相对而言尹占华的《唐宋赋的诗化与散文化》(《西北师大学报》1999年第1期)一文更侧重于赋体本身发展的趋势并论及赋与散文的关系问题。许东海的《论李白诗赋交融及其在唐代文学史的意义》则属诗赋合流的个案分析。专属于唐的是赋与唐传奇的关系问题。朱迪光《“赋”的含义及其对传奇话本的影响》(《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从“赋”的含义出发,重点探讨它对叙事文学创作的影响。陈节《论赋与唐传奇的关系》(《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一文从赋和小说的历史渊源、叙事角度、文采、虚构等几方面作了具体的探析。应锦襄《试谈赋与唐人传奇的关系——读美人赋 偶得》则从具体作品出发谈论赋与传奇的关系问题。

三、作家作品研究

赋体文学真正深入而且自觉的研究应当涉及具体作家作品的探究,但在诗文鼎盛的唐代,以赋成名的作家难于引人注目,过于深狭的研究也不被宏观

综合的时代学风所看重。所以唐代赋家赋作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李白、杜甫、柳宗元、韩愈、四杰等少数诗文大家及被选入中学教材的《阿房宫赋》等少数赋作上。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类成果多为专家研究求深求新的产品,有关李、杜赋作的研究文章便多因专门学术会议而起,多刊于专门的学术刊物,比如许东海《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的辞赋身影》、葛景春《李白东都洛阳献赋考》、毛永清《李白献赋考》、樊英民《李白诗赋中的双声叠韵现象》、杨明《论李白大鹏赋的主旨——兼谈大鹏意象的演变》等文章都刊于《中国李白研究》,而章起《雕赋与杜甫的正色立朝》、詹杭伦与沈时蓉《越人献驯象赋与杜甫关系献疑》、邝健行《从唐代试赋角度论杜甫三大礼赋体貌》、刘朝谦《杜甫赋文心迹与赋论、赋评》、韩成武与韩梦泽《杜甫献赋出身而未能立即得官之原因考》、李凤玲《赋料扬雄敌——谈扬雄对杜甫赋作的影响》、郭院林《俊异意象背后的悲情——试析杜甫雕赋与天狗赋》、刘文刚《论杜甫的赋——兼及杜甫赋与诗的比较》、杨经华《生存的困境与文学的异化——杜甫诗赋比较研究》等文章都刊于《杜甫研究学刊》。

对大家赋作的研究未必有着自觉的赋体文学意识与立场,但也不会自限疆域,它的宽广的研究思路往往可以成为“小家小作”研究的效仿对象。

相对而言,柳宗元不特为诗、文大家,在辞赋创作上也做出了异乎寻常的贡献,他的赋既具有充实的内容,又不乏灵活多变的形式。具体来说,柳赋中充溢着批判现实的情怀、发泄不遇的怨愤与执著于理想的精神,也融洽着比兴与讽刺的艺术。这与屈骚的影响密不可分,怪不得严羽说“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30年来对柳赋的研究也多半围绕着这一中心。

论韩愈赋作的文章不多,且以概述为主,如杨友庭《韩愈赋评》(《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周悦《论韩愈的辞赋》(《湖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贾名党《韩愈与刘禹锡赋风论略》(《铜陵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等。此外何锡光《韩愈以赋为诗论(上)(下)》(《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6期)从文体互渗的角度探讨了韩愈奇险诗风的成因。

“四杰”在六朝至隋唐的文学演变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近年来有关“四杰”赋作研究的文章也多从这一角度立论。如胡朝雯《初唐“四杰”的辞赋、骈文对诗歌革新的影响》(《衡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1年第4期),哈温巍《初唐“四杰”的赋作对唐代赋体文的开拓意义》(《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高光复《论“四杰”辞赋与唐初文风》(《文史哲》1990年第5期),何易展《“四杰”骈赋的律化倾向及与六朝骈赋的差异》(《许昌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阿忠荣《初唐“四杰”的赋体创作》(《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除以上各家外,尚有少量文章论及白居易、刘禹锡、李华、张九龄、温庭筠等人的赋作。单篇作品最受关注的当然还是《阿房宫赋》。

四、赋学赋论研究

唐代赋学赋论不甚发达,所以国内第一部赋论方面的资料集徐志啸《历代赋论辑要》辑录了自西汉至清末民初的赋论资料90篇,但属于唐代的只有刘知几《史通·载文》(节录)、白居易《赋赋》、皮日休《文薮序》(节录)三种。编者还在序言中说:“唐宋两代的论赋文字,基本上沿袭了前代观点,无甚新见。”^[818]谈到赋论中衰的原因,编者说:“唐、宋、元三代是赋论的低谷期,无论赋的研究抑或有关赋的论文、著作均少于唐以前和元之后,其原因恐怕主要是因为赋在这三朝处于衰落期,其时,‘正宗’的赋已几乎不可见,文坛所产生的赋,要么谈不上艺术价值,纯为考士制的律赋,要么是名为赋而实属散文的文献。”^[818]

类似的观点也体现在何新文的《中国赋论史稿》里:“唐宋两代,赋的创作有新的发展变化。但赋的成就无论如何也难以和诗、词相比,批评家对赋的兴趣当然也远不如诗与词。因此,唐宋赋论前不及汉魏六朝,后不如元明清三代,成为我国古代赋论发展史上的停滞期。”^[9173]该书第三章为“唐宋赋论”,下分“唐宋赋论概述”、“白居易的《赋赋》及其他”、“唐宋笔记、诗话中的赋论”、“唐宋的赋格书”、“朱熹对司马相如、扬雄赋的批评”等五节。

通论性的赋学赋论著作还有许结的《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该书分上、中、下三编,上编“本体论”,中编“因革论”,下编“批评论”。中编第四章“论唐代赋学的历史形态”是结合创作来谈理论的。在这一章里,许先生首论唐赋艺术的衍变历程,认为唐赋创作与理论的发展经历三个主要阶段:初唐赋学,盛世赋学,中唐贞元以降赋学,次论科举试赋与古律问题,最后论唐代赋学的文化内涵。谈到唐代赋论中衰及其原因时,许先生说:“究其原因,有两点最为突出:一曰功利性。在唐代,无论是唐初学者

排斥‘齐梁体’反赋,还是中岁起用‘齐梁体’考赋,无论古体派倡‘明道’,还是律体派重‘六义’,其缘起现实政治之功利,为其共通心态……如此过份强调功利,必然导致赋体自身艺术价值的失落。二曰依附性。如果说汉、晋赋论之于诗论尚有一定的前引性,则随着魏晋时代文学创作中心由赋体向诗体的转移,唐代赋学在建构伊始即表现出向诗学依附的特性。^{[10]245}

说到律赋理论,不能不提詹杭伦先生的《唐宋赋学研究》。该书研究的重点在唐宋律赋,书中与唐代赋学研究相关的篇章有:第一章“唐宋赋学研究之我见”,第二章“唐抄本《赋谱》初探”,第三章“《赋谱》校注”,第四章“《释迦佛赋》作者考辨”,第五章“白居易的赋论与赋作”,第六章“王棨山水写景律赋探析”,其中关于《赋谱》论赋术语的介绍,对于了解唐代律赋的结构及唐代赋学批评的状况确实重要,也确实可以为研究者、爱好者提供欣赏律赋的门径。

关于唐代赋学赋论的研究还有一些单篇的文章,多为总括性质或有关唐人汉赋观的文章,比如:王以宪《唐宋赋学批评述要》(《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何新文、张群《唐代赋论概观》(《北方论丛》2008年第1期),苍梧《唐人如何对待辞赋》(《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3期),张新科《唐宋时期汉赋的经典化过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王朝源、王红霞《唐代汉赋观简述》(《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雷恩海《赋之再发现暨元白的理论贡献》(《西北师大学报》2006年第2期)。

最后要提的是程章灿先生以传统的批评方式创作的《论赋绝句五十首》、《后论赋绝句五十首》,前一篇专论先秦两汉赋,后一篇专论唐宋两代赋,比较集中地表达了他对这两段赋史的一些看法。在今天看来,这种传统方式所作的批评仍不失为警醒简约的别致之作。

五、学术交流与学位论文选题情况

学术会议是学术交流最为重要的平台,1988年以来,赋学界共举办了2次全国性的研讨会和7次国际性研讨会。首届全国赋学会由全国韵文学会、赋学研究会、湖南省古典文学研究会、湖南师范大学、衡阳师专联合发起,1988年在湖南衡阳召开。1989年在四川江油,由赋学研究会、四川师范大学等单位联合举办了全国第二届赋学研讨会。1991

年,由山东大学、赋学研究会、湖南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等联合发起,在山东济南召开了首届国际赋学研讨会。此后分别在香港(1992年)、台湾(1996年)、南京(1998年)、漳州(2000年)、成都(2004年)、兰州(2007年)等地召开了第二至第七届国际辞赋学会议。从历次会议提交的论文来看,唐以后的辞赋研究文章日趋增多。1989年赋学会议出版的论文集有文章28篇,而与唐有关的研究文章仅有3篇。到1998年的南京会议,与会代表提交的47篇论文中,与汉以后辞赋有关的已达20篇。再到2000年的漳州会议,与会代表提交的58篇论文中,唐以后的辞赋占到31篇。成都会议与兰州会议提交的论文总数大大增加,研究唐及其以后的辞赋论文数量更远远超过以往,而且现代辞赋的创作也纳入了学术研究的视野。这种状况与学术研究内在的理路有关,也与学术会议的促动分不开。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时任全国赋学会会长的马积高先生就曾呼吁,赋学研究应该向后延伸。马先生的呼吁,引起了全国赋学界的充分关注和响应。于唐赋研究而言,赋学以外的会议,比如李白研究会、杜甫研究会、柳宗元研究会等也会产生不少赋学方面的研究论文。

除学术会议以外,研究中心的成立、学术丛书的出版与研究专栏的开辟等等也都彰显着近年来赋学研究的整体力量。

最能反映学术前沿的是学位论文,笔者于2009年7月22日查检知网《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来源覆盖率96%,文献收全率91%)与《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共查出2001年至2008年有关赋学的论文173篇(博士论文13篇,硕士论文160篇),其中汉代58篇,魏晋南北朝44篇(还有跨汉魏六朝的12篇,跨先秦两汉的5篇,通论12篇),唐代也占到22篇之多,其中有11篇是2008年完成的,占到半数之多,可见唐赋研究近年来正成为学位论文的重要选题。

顺便提一下,在173篇学位论文中,以赋家与题材为研究对象的分别占到41与37篇。其中题材涉及都邑、宫殿、音乐、寓言、咏史怀古、山水、器用、美人、纪行、讽刺、农桑、自喻、悲情等等,光音乐题材赋的研究就达9篇之多;甚至有题材完全相同的,如两篇题为《汉魏六朝音乐赋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

台湾的赋学学位论文也不少,台湾“国家图书馆”全国硕博士论文资讯网收录1976至2008年台湾地区赋学论文共134篇,其中以唐代为辞赋研

究对象的18篇。

综上所述,近30年来,唐赋研究不仅在观念上得到了重视,在实践上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管是基础性的文献整理工作,还是专门的断代与分体研究,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更为可喜的是,在赋学会议与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中,唐以后赋尤其唐赋所占份量日益增多,这无疑标示着唐赋研究良好的势头。当然,与汉赋的研究及唐诗的研究相比,唐赋研究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我们无意于与汉赋或唐诗争地位。就文学史的整体而言,唐赋的地位也难于超越汉赋或唐诗;但这不等于在某个学术研究的具体时段里,唐赋研究的成果不能超越汉赋或唐诗;更重要的是,汉赋与唐诗研究的某些视角与手法可以成为唐赋研究的重要借鉴。比如唐代赋家赋作的全面清理与考订笺注,比如有关唐赋的趣话佳话及唐赋作品尤其律赋的普及工作,比如科举与试赋及其对文学与文人乃至政治的影响,比如赋学批评理论尤其律赋结构理论与俗赋叙事理论的建设与对西方文艺理论的借鉴与比较,比如赋体作品的感性与审美批评等等。于赋体文学而言,还应将其

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它在文化学上的意义和内涵。

参考文献:

- [1] 马积高. 赋史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2] 余重. 关于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J]. 艺谭, 1989(1).
- [3] 许结. 《赋史》异议 [J]. 读书, 1988(6).
- [4] 韩晖. 隋及初盛唐赋风研究 [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290 - 291.
- [5] 赵俊波. 中晚唐赋分体研究 [M]. 北京:华龄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7.
- [6] 朱光潜. 朱光潜全集:第3卷 [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7.
- [7] 商伟. 论初唐诗歌的赋化 [J]. 北京大学学报, 1986(5).
- [8] 徐志啸. 历代赋论辑要 [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1: 8.
- [9] 何新文. 中国赋论史稿 [M]. 北京:开明出版社, 1993: 73.
- [10] 许结. 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 [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1: 245.

责任编辑:李珂

(上接第138页)

的传播学意义。很多西方人,特别是年青人正是通过章子怡、姚明而知道“中国”这个概念。那么,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我们称之为当代“神话”,它演绎的是古老的中华文明,传播的是中国文化精粹。它无论是对中国还是世界都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如果我们把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放在全球金融危机这个大的背景下,就更能考察其价值。2008年的中国,南方雪灾、拉萨骚乱、汶川地震、股市暴跌,但在世界瞩目的奥运会上,我们举重若轻,不仅取得金牌第一的辉煌成绩,在圣火熄灭,余温尚存之际又把神州七号送上了太空。在由美国次贷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之际,温家宝总理多次在国内外表示: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奥运会开幕式“神话”彰显了中国的自信。北京奥运会一年之后,我们又在北京举行建国六十周年系列庆典,继奥运场馆“水立方”之后天安门又有了“光立方”。奥运开幕式“神话”催生的系列国庆庆典,再次激发全民的豪情,人们不难看出

奥运会开幕式与60周年国庆狂欢之间的内在联系,它们必将以其辉煌载入史册,感动世界。

参考文献:

- [1] 曹础基. 庄子浅注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2: 2.
- [2]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28.
- [3] 陈慧,袁宪军,吴伟仁. 一部眼界宏阔的文学批评专著——批评的剖析译序 [M]//弗莱. 批评的剖析.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8: 39.
- [4] 弗莱. 批评的剖析 [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8: 151.
- [5] 姜圣瑜. 中外报纸报道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标题的比较及启示 [J]. 传媒观察, 2008(9).

责任编辑:卫华